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及其消除分析

刘振彪, 陈建中

(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人民币升值压力源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工资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 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 分析认为, 只有通过建立竞争性要素市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更灵活和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 才能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

关键词: 汇率; 人民币升值; 内外经济失衡; 经济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3-0365-07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人民币汇率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经济变量。目前, 人民币升值压力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商界和政策当局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美日等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中国要正确选择一个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人民币汇率, 迫切需要对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如何消除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驱使一国货币升值的压力有两种, 一种是短期压力, 来源于该国的内外经济失衡, 表现为该国国际收支大量持续顺差和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 一种是长期压力, 是该国经济长期走强的结果, 表现为该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竞争力的增强。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中国外部经济失衡表现为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而内部经济失衡表现为经济过热和潜在的通货膨胀; 来源于中国经济效率改进的升值压力并不大。因此, 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一) 持续双顺差产生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1994年以前, 中国的经济运行基本表现为净进口大于净出口的双缺口, 由于缺口不大, 可以说中国对

外贸易基本平衡; 1994年以来, 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巨额顺差, 同时, 中国一直重视引进外资, 直接投资项下每年都有大量资本流入。就是比较特殊的1998年, 在资本项目出现63亿美元逆差的同时, 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却分别保持了314.7亿美元和411.2亿美元的顺差, 除此而外, 其余年份均为双顺差, 而且国际收支顺差规模呈扩大之势, 1994年401亿美元, 2000年最少, 为224.4亿美元, 到2003年增加到986.4亿美元, 2004年超过了1800亿美元, 2005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 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达到2599亿美元; 国际收支顺差规模持续扩大使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2000年末, 中国外汇储备为1655亿美元; 2006年末, 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 到2007年末, 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5530亿美元(见表1)。长达10多年的双顺差,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 表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内外经济不均衡, 产生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 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产生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由于内外经济失衡, 中国经济运行形成了出口和投资互相推动、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格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 中国实施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从此以后, 中国的经济运行及其调节就一步一步地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紧紧地拴在一起, 造成了中国不断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经济“补贴”、却让

表 1 中国外汇储备变动

单位: 亿美元

年月	外汇储备	年月	外汇储备	年月	外汇储备
2000.12	1 655.74	2003.12	4 032.51	2006.12	1 0663.44
2001.12	2 121.65	2004.12	6 099.32	2007.12	1 5530.06
2002.12	2 864.07	2005.12	8 188.72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的被动局面。

从实体经济看,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资源价格和极低的资金成本导致中国国内投资快速扩张、经济过热;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大国,特别是石油和铁矿石更为紧缺,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以原油为例,自从 1993 年由原油净出口变成净进口国以后,原油净进口逐年增加,2000 年超过 5 000 万吨,2004 年超过 1 亿吨;2004 年中国石油需求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对外依存度达到 40%。低廉的资源价格刺激国内需求,从而带动了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大幅上扬,铁矿石价格仅 2005 年就上涨了 71.5%;进口的资源通过国内生产环节加工制成产品,完成生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产能和产品增长很快,国内市场又容纳不下和消费不了,中国生产的产品又不得不大量出口,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循环。中国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中国出口每年以超过 30% 的速度增长,2006 年中国的新增贸易额占全球国际贸易新增额的 10% 强。因此,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的投入和产出、生产循环和商品循环都是通过国际市场完成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对国际市场的双向依赖。随着中国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这种对国际市场的双向依赖使中国陷入恶性循环,中国正在变相地向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转移财富。

从货币经济看,同样存在着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一方面,中国通过政策倾斜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外资,再加上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人民币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大量热钱流入,国际游资基本上变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国内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地大量发行票据,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这就形成中国国内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循环。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和汇率风险,中国不得不用其购买美国证券,或者存放在外国银行,外国企业再将其投资中国,形成资金和货币的国外循环。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下,中国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工具无法调节内外经济失衡,只

能听任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国内资金不断净流出,现有资源也没有有效利用,形成了中国货币活动对国外市场的双向依赖。

由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形成了“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格局。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货币发行很多,也没有通货膨胀之虞,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累创新高,2004 年分别达到 4 000 亿美元和 6 000 亿美元,分别占美国 GDP 的 4% 和 6% 左右,但美国经济安然无恙。只要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口不断增长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美国的双赤字就能维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核心技术缺乏症。不仅如此,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占用了国内的资源,加剧了能源紧张,增大了环境压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带来了大量美元,进一步加剧了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

(三) 工资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产生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和技术持续进步,中国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90~2006 年,扣除价格因素,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分别提高了 5.13 和 3.06 倍,美国分别提高了 1.41 和 1.09 倍(见表 2)。中国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快于美国,相对于美国产品来说,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在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下,人民币购买力(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与美元购买力(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的比率,即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实际汇率(人民币升值)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同步增长,那么中国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存在。事实上,香港经济发展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由于劳动力供给紧张,经济快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使消费品价格不变甚至下跌,另一方面,带来了工资水平以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增长率上升,从而消除了港币因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升值压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生

表2 中美两国工业部门工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比较^①

年份	中国 ^②				美国 ^③			
	工资 ^④ / 元	工资 增长率	劳动生产 率 ^⑤ /(元·人 ⁻¹)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工资 ^④ / 美元	工资 增长率	劳动生产 率 ^⑤ /(美元·人 ⁻¹)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1990	2 153	1.00	7 072	1.00	26 885	1.00	76 622	1.00
1991	2 367	1.06	8 130	1.08	27 812	0.99	79 879	1.02
1992	2 723	1.15	10 064	1.25	29 153	1.01	84 059	1.07
1993	3 366	1.24	13 513	1.36	29 767	1.00	87 529	1.09
1994	4 339	1.29	17 968	1.51	30 632	1.01	94 140	1.17
1995	5 255	1.33	22 485	1.65	31 308	0.99	98 258	1.20
1996	5 797	1.32	26 589	1.89	32 351	1.00	100 098	1.20
1997	6 172	1.40	30 114	2.15	33 907	1.02	108 639	1.24
1998	7 432	1.71	35 813	2.67	34 639	1.03	111 612	1.33
1999	8 078	1.88	38 723	2.95	36 047	1.06	117 137	1.37
2000	9 115	2.11	43 755	3.25	37 066	1.05	118 522	1.34
2001	10 248	2.36	47 702	3.58	37 347	1.04	116 750	1.35
2002	11 089	2.57	50 218	3.86	39 083	1.05	119 436	1.37
2003	13 149	2.72	54 087	4.25	40 122	1.06	119 772	1.38
2004	15 621	2.83	58 031	4.61	41 065	1.07	120 633	1.37
2005	18 437	2.97	63 428	4.84	41 978	1.08	121 565	1.39
2006	21 285	3.06	68 303	5.13	42 904	1.09	122 247	1.41

注: ① 增长率以 1990=1.00 为起点, 采用价格指数缩减得出; ②按中国现行统计口径, 工业部门包括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系工业部门职工平均工资; ④系工业增加值与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之比; ⑤美国工业部门系制造业, 不包括采掘业, 也不包括电、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⑥美国工资系制造业全体雇员毛收入; ⑦系制造业增加值与全体雇员人数之比。

产率特别是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反映在外资企业利润的增长或者竞争带来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 前者利于国外投资者, 后者利于国外消费者; 而中国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上涨或上涨速度远慢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 劳动生产率提升也给人民币带来了一定的升值压力。

(四) 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产生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 采取各种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 同时限制进口和资本流出, 结果导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经济增长下滑和失业增加,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大量购买外汇以阻止人民币升值, 结果导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加之, 中国的国债市场还不完善, 市场规模也不大, 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冲销性干预既不可能, 也十分困难。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不断增加带来了国内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 行政管制下的低利率使中国货币乘数效应被放大, 国内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导致国内总需求严重超过国内总供给, 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加大。如果允许人

民币升值,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同样的外汇资产增加带来的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幅度就会相对小一些, 相应地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就会轻一些; 更何况允许人民币升值, 会带来中国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入的减少、进口和国际资本流出的增加, 使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减少, 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因中国人民银行外汇资产减少而减少, 通货膨胀压力减轻。因此, 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也会加大。

二、目前的内外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入特定时期各种矛盾的产物

无论是从经济数量指标还是从经济质量指标上看,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 一国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正是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会结构、市场结构等变化最为急速的时期, 同时也是各种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一) 中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

中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必然是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加快,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产生质的变化,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条件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迅速持续地下降,形成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国在不长的时期里,工业化加速会面临几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另一方面,工业化加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本身将从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向以劳动对象工业和劳动资料工业为主深化,因而重化工倾向日益明显,由此出现的资本问题、技术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本对劳动的排斥问题等等都会进一步尖锐。例如,工业化加速往往伴随资源消耗迅速上升,整个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受到资源的严重约束;如果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滞后,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缓慢,对资源的消耗速度必然会越来越快,从而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近年来,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06年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成本压力可想而知。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往往是在长期中逐渐发生的,但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这种变化却可能在较短的时期里发生,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因为在长期里发生的国民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结构、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可以在较长的时期中逐渐适应并做出相应调整,但若在短期里迅速发生,社会往往难以适应。

中国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宏观经济运行复杂多变和调控困难加大的时期。一方面,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失衡表现出复杂多变性,失衡不仅仅简单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的总量矛盾,而且同时伴随着一系列与通常的经济逻辑相悖的结构性矛盾。从中国目前的内外经济失衡来看,既不能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不能认为反通货膨胀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也难以说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不能认为增加就业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现阶段中国内外经济失衡至少存在三大悖论,即国内市场总需求增长乏力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大过快,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同时失业率反而继续攀升。这就使得中国政府既难以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难以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加速时期,政府实现宏观经济政

策目标的困难不断加大,无论是反通货膨胀目标,还是减少失业率目标,都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阻力。就反通货膨胀而言,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普遍较高,高的年份平均达到30%以上;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平均通货膨胀率更高,比下中等收入阶段平均高出1倍以上,高的年份平均达到60%以上;只有到高收入发展阶段,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二元经济转型之后,通货膨胀率才又回落到10%以内,整个过程呈现出倒U字型。就反失业而言,工业化加速时期,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由于市场化的深入,以往大量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以中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40多万个,而到工业化加速阶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到100万个。

(二) 市场制度不完善加剧了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

中国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改革开放步伐太快,也不是市场经济发展过头,而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计划经济的残余和国有制偏好情结所形成的不公平行业准入和退出、产权结构灰色法规下的“非经济人”市场主体等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市场制度的不完善。

中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要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从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来看,近几年来,虽然劳动力市场化速度在加快,企业职工(无论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基本上由市场决定,政府只行政性决定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传统户籍、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因素仍然存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很难跨地区、跨城乡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有序性、有效性还亟待提高。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而言,中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规模小,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不足10%,二是秩序乱,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尽管利率控制开始有所放松,银行体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但是,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要素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与资本

市场化相比较, 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 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 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 还是在交易制度上, 无论是在价格决定上, 还是在法律制度上,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要素市场化发育的滞后, 是中国市场改革深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 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市场制度的完善。

由于要素市场化发育滞后, 要素价格十分廉价。中国人力资源丰富, 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劳动力十分便宜, 工资水平是日本的 1/25、美国的 1/20;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突出表现为劳动力缺乏合理的保护、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等。中国资源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协调, 政府行政管制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 资源价格被压得很低, 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从而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费、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环境污染。由于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 行政管制下的资金价格(利率)也较低, 目前, 中国七天回购利率略微高于 1%, 而仅仅是隔夜息的美国隔夜联邦基金拆借利率已达 4%。一方面, 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虽然使中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了 GDP, 但很难脱离“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经济增长老路, 企业缺乏进行自主创新的压力和动力, 大量投资集中于低端产业, 遍地开花的低端产业不断地制造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 另一方面, 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导致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过热, 造成资源错配, 为将来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埋下隐患。

计划经济的残余和所有制偏好情结所形成的行业垄断, 特别是服务行业垄断在中国仍然存在。中国许多行业仍然被限制为“特殊行业”, 而由国有部门垄断, 民间资本很难进入, 比如服务行业中的金融业、电信业、教育产业和传媒产业, 等等。以金融改革为例, 中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和国内外上市, 而把基本的金融改革进程放缓了; 像开放民间金融资本领域, 迄今仍没有实质性政策出台。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建立在国有产权之上, 国有银行上市后, 其治理结构仍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银行管理人员仍是国家干部由政府任命, 而不是由股东聘请。居民投资和理财产品奇缺, 导致民营企业和居民只能把钱存到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大量资金在政府主导下被投入到盈利能力低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股占主要比重的低效率的上市公司, 大量资金没有创造出新的收益。许多领域被政府垄断而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 导致民营资本缺乏投资渠道, 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造成制度性的失业, 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以来低于 GDP 增长率, 导致了居民购买力没有增强; 加之中国目前的社

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 人们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如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或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大, 增加了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 居民只能压抑即期消费, 增加储蓄。过度储蓄加上国有部门过度投资造成产能过剩。面对这种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 政府惟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出口和投资, 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出口和投资互相推动的格局。

(三)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很难解决中国目前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

中国目前的内外经济失衡主要源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结构失衡, 单靠人民币升值很难实现内外经济平衡; 况且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人民币升值基本不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最终售价。首先, 中国现行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 5%, 即使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升值 100%, 也仅为美国的 10%, 中国出口产品仍然具有相对优势; 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离岸价格约为海外零售价的 30%, 即使人民币升值 100%, 产品最终售价只会上升 30%, 如果上升 10%, 只会上升 3%, 对中国出口产品也没有明显的影响。更何况人民币在现有基础上升值 100%是不可能的, 靠人民币升值将很难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其次, 中国出口产品最终售价中非贸易成分占比不断提高, 美国等海外市场需求对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性下降。据估计, 中国贸易的价值链基本上由美国企业控制, 美国自中国进口 1 美元的产品在美零售价约 4 美元, 3 美元被美国的品牌拥有者和流通领域赚走; 中国所得的 1 美元中, 20 美分的利润和折旧, 往往被出口的外资企业获取, 30 美分用于购买进口原料, 中国投入的大量劳动力仅得 50 美分。另外,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使国内出口企业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 为争取出口份额, 国内出口企业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 国内出口企业面临的竞争仍然是相互之间的竞争, 而不是来自于境外同类企业的竞争, 人民币升值很难达到减少对美等国出口、增加进口、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 工业消费品出口远大于进口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顺差的不平衡局面将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长期存在。所以说, 在经济转型与工业化过程中,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而没有国内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相配套, 将难以解决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因此, 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后,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状况会较快得到根本性改变的看法, 是不符合中国经济

发展现实的。

三、消除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与对策

由于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源于内外经济失衡,而内外经济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入特定时期各种矛盾的产物。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完善市场制度实现要素价格合理,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进而实现中国内外经济平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一) 创建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价格合理

从产权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素价格的形成和决定问题实际上是产权如何决定和产权如何交易问题的现实反映,因此,要素价格问题实际是产权问题。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看,要素价格合理是指各自拥有独立财产权的市场主体在要素交易活动中一致接受的价格,是要素买卖双方在交易中通过相互竞争和相互选择,并通过双方的相互约束或讨价还价而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财产所有权分散化、且财产权得到法律的明确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

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框架内,只有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国家实际上掌握全社会绝大部分要素的产权。国家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国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低要素价格的途径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要素所有者特别是劳动者完全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作为要素使用者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拥有独立财产的产权主体,不具有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避免亏损并获得更多的盈利以扩充自身财产的内在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这种传统的不合理产权制度,中国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很难市场化。只有对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形成主体多元化的财产权制度,才能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一个有利于要素价格市场化的合理的产权制度就是要使国家和社会公众既有按契约取得、占有、控制、使用和按自己的意愿处置生产要素的自由,同时又使国家和社会公众独立承担占有、使用及处置生产要素的责任、义务或因使用、处置生产要素不当所造成的风险或损失。

在主体多元的产权制度基础上,要素价格就只能由要素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来决定,即要素价格只能由要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而不可能由政府采取行政

手段来硬性规定。由要素买卖双方通过相互讨价还价所最终确定的要素价格必然是为买卖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买卖双方所一致决定的要素价格必然会真正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可见,主体多元的产权制度将自然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和要素价格管理体制的行政化问题,并由此而真正解决中国要素价格水平过低及要素价格结构不合理的弊端,从而真正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和最优配置。

在主体多元的产权制度基础上,让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不会导致生产要素过低和过高。因为:拥有独立财产权的生产要素买卖双方都要独立承担经营的成本、风险或亏损责任,要素购买者是绝对不会接受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过高的生产要素价格,而要素出售者也不敢任意抬高要素价格,因为这只会使自己拥有的要素卖不出去,从而也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要素买卖双方会使要素价格趋向一个均衡点,而不可能无限制地上升和下降。要素价格市场化以后,那些成本过高或利润率大大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低效率企业将会在均衡要素价格下被逐步淘汰而自动退出市场,而只有那些利润率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高效率企业才有能力在均衡要素价格下获得更多的资源以不断扩大生产或投资规模,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中国整体的生产效率或盈利能力。因此,创建主体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也是经济发展最终摆脱“冷热”循环、实现内部经济平衡的关键。

(二)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对解决中国目前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无论是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还是缓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还是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关键在于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带来的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首先涉及的是自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以社会制度创新为基本前提和保障的。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效率提升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无论是作为理论观点还是作为政策主张由来已久,但为何长期未见成效,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

创新不够, 致使竞争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

加速竞争性要素市场发展, 将中国社会化生产程度最高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的理性的市场主体, 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主体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市场主体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和自主创新的主体, 有利于建立和健全能将储蓄顺利地转化为有效投资的资本市场。通过建立和规范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 发挥股票市场分散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投资风险的功能, 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利, 使股票市场成为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渠道而不是投机工具, 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生产性领域, 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

(三) 创新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

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使中国更容易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走向完善的根本出路。要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制度, 使中央银行能通过利用外汇平准基金间接干预外汇市场, 将人民币汇率交由商业银行和企业自行决定, 以反映真实的市场状况; 要吸收企业为外汇市场成员, 实行意愿结汇制, 改变目前银行单方决定汇率的不合理现象, 提高外汇市场的效率; 要借鉴国际外汇市场的良好经验, 使外汇交易币种、品种和交易方式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自由兑换。放

开贸易融资, 允许对外贸易采取远期信用证方式, 接受延期收款或付款, 办理买方信贷, 不超过规定期限的可以自由进行, 而不予限制, 但要防止利用贸易融资进行逃汇、套汇活动;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对外债继续实行规模和结构控制; 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结汇的限制, 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支持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和开展业务; 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 [1] Edwards S. Real exchange rates, devaluation and adjustment: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2] Stein J, Allen P R, et al.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exchange rat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张曙光. 人民币汇率问题: 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5): 17-30.
- [4] 江春. 超额货币与人民币汇率[J]. 经济科学, 2006, (1): 52-64.
- [5] 曹凤歧.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研究[J]. 金融研究, 2005, (1): 43-51.
- [6] 施建淮. 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J]. 经济研究, 2007, (1): 41-55.
- [7] 余永定, 覃东海. 中国的双顺差: 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 世界经济, 2006, (3): 24-33.
- [8] 刘伟.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 经济研究, 2006, (1): 4-10.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RMB Appreciation Pressure and Way to Remove it

LIU Zhenbiao, CHEN Jianzhong

(Central South School, Business School,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essure of RMB appreciation, which is led by the China's disequilibrium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lasting double favorabl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no wage promotion responding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o appreciate RMB exchange rate sharply is disadvantageous for China and even for the whol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at to speed up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 through establishing competitive factor market, to make RMB exchange rate more flexible and reflect the change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rough improving the RMB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 can remove the pressure of RMB appreciation.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RMB appreciation; disequilibrium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mode

[编辑: 汪晓]